

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历史的一点补充

王 燮 中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我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它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过三年多一点。按传统的说法，1878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人筹建，中间几经曲折，数易其人，终于在1890年开车生产。开工后营业兴盛，获利丰厚。1893年10月工厂毁于火，李鸿章派盛宣怀、聂缉槩负责清理规复事宜，后盛聂两氏在是局基础上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于1894年复工生产^①。这里有两点值得商榷：

（一）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主办人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之于《中国棉纺织史稿》，说它的主办人先是郑观应，继之是盛宣怀接办^②。虽然在1979年出版的《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这一著作中，提到在1890年到1893年10月间是由杨藕芳（宗瀚）主持局务的^③，但此说似乎并未被许多有关论著所采用。如198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稿》中有关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叙述就是基本沿用了前述传统的说法^④。在许多近年出版的有关近代经济史的著作和教科书中也大率如此。因此，有关主办者的问题仍有辨正的必要。

前面提到的传统说法至少是含混不清的。在1890—1893年10月这段时间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主办人既非郑观应亦非盛宣怀，正是无锡人杨藕芳（宗瀚）。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恐怕与这段时间内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的许多事鲜为后人知晓有关，例如杨藕芳就很少见诸于经传。

有关杨藕芳在1890年～1893年10月期间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因缘始末，在杨氏侄

孙杨通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透露：“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李鸿章电召杨藕芳接办筹设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总办。是局自1878年由郑观应等筹划以来，历年亏折，主其事者屡易无人，至是始建成。”^⑤有一个资料可以为此佐证。钱钟汉在《无锡五个主要产业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谈到杨氏资本系统时，写道：“杨藕芳曾在李鸿章官办纺织新局做过会办。”^⑥查李鸿章只办过一个纺织新局，那就是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当然，钱氏在这里说其是官办的则不确，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还有个情况值得一提。杨藕芳之父杨菊仙与李鸿章是甲辰乡试同年，丁未会试同号。李鸿章在考试期间疾作，杨菊仙为其料理汤药，使其顺利完成了考试。故于同年中，李杨交谊最笃^⑦。杨菊仙早逝，其子杨艺芳（宗谦）杨藕芳兄弟投于李鸿章门下。李鸿章曾依靠杨氏兄弟筹管军饷，李杨关系之深可想见一斑。因此，李召杨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完全可能的。上述资料虽属私家性质，但却与《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的叙述互为印证，证明传统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有疏漏

①②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4—92页。

③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279—281页。

④ 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第278—281页。

⑤⑦ 杨通谊：《无锡杨氏与中国棉纺织业的关系》，载《工商史料》2。

⑥ 钱钟汉：《无锡五个主要产业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之处。

说到这里还应叙一下杨氏到任前后该局一些情况。李鸿章之所以舍郑观应等人电召杨藕芳来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用杨通谊的话来说乃是“历年亏折”的缘故。亏折到什么程度呢?上海机器织布局自1878年候补道彭某呈请开设以来,十二年间主办者迭经郑观应、龚寿图、彝图兄弟、盛宣怀、经元善接着又是龚氏兄弟、马建忠诸人,历年亏损。郑观应、龚氏兄弟等在筹办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到1887年,“维时洋匠羁留日久,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势将兴讼”,终于不得不重订章程。按新章程,旧股百两者,限三个月内续交三十两,换发新股票百两。这就是说,机器还没有安装,原来资本倒已亏折了百分之三十^⑨。很明显李鸿章之电召杨藕芳来主办是要其扭转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严重亏损局面的。事实证明,杨藕芳确是不负所托,到任后,“期年规模大定,获利三十余万两。”^⑩

杨藕芳到上海机器织布局后,为扭亏为盈,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拨借绥巩局银十余万两,以资营运;(2)抑制洋匠权限,使主持机务,而人事赏罚黜陟则总办主之;(3)按律惩治地棍首脑,使不得恃众滋事,要挟厂务^⑪。从这三条措施,我们可以大略想见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开车之前的状况:(1)主办人经营无术,只知中饱私囊,经营管理十分腐朽落后,故企业资本虽然由原计划的四十万两增到五十万两,仍不敷周转。(2)“洋人”控制了企业大权,为所欲为,故杨藕芳不得不限制他们的权限。(3)封建地方势力横加阻挠,此类事情在当时兴办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过程中各地时有发生。例如,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1905年与人合办无锡振新纱厂时,也曾受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

上述三点,其实乃是当时资本主义新兴工矿企业的通病。杨藕芳采取三条措施击

中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存在问题的要害,虽然作为局中人,他不可能从根本上使局面得到改观,但也确乎取得了某些成效,达到了扭亏为盈的目的。

(二)关于1893年10月那场火灾,一般说法都是认为该局除了监工女监房屋外,全部毁于火。这一点在有关的论著中,至今还未见有不同的说法。其实这是李鸿章的说法^⑫。杨通谊对此提出了怀疑。他认为工厂10月失于火,11月李鸿章就命盛宣怀来接办了,因此火灾损害程度并非那么严重^⑬。笔者认为此话不无道理。试想,据当时清查,火灾损失不下七十余万两,而居然能在不到一年功夫的1894年9月就以华盛纺织总厂的名义使工厂开车生产了,这不显得有点异常么?无怪乎《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也觉得“上海织布局的规复,进行得异常顺利”了^⑭。他也认为“华盛开办得如此迅速,似乎不很可能。”^⑮不过,他是从别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异常现象的。其次,李鸿章在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之后说:“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他非但要恢复该局,而且立意要在上海设一个机器纺织总厂,再准备另设十个分厂^⑯。这里,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获利优厚,1893年是局的利润率为百分之二十五^⑰,从而刺激了他的欲望之故。但李鸿章在说这番话时恐怕也要考虑一下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后的实际情况,如果该局尽毁于火,那末李氏恐怕不会发此雄心勃勃之语了。再者,按当时的估计,该局损失达

⑨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0页。

⑩⑪ 杨通谊:《无锡杨氏与中国棉纺织业的关系》,载《工商史料》2。

⑫ 光绪19年9月24日寄江海关聂道、招商局沈道电,李文忠公电稿,卷十五。参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1页正文及注(6)。

⑬ 杨通谊:《无锡杨氏与中国棉纺织业的关系》,载《工商史料》2。

⑭⑮⑯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2页。

70余万两，全厂房屋货物用具等等，靡有孑遗^①。而不到一年功夫，华盛开车时竟拥有设备64556枚纱锭，750台布机，资本计85万两^②。当时筹集股本是颇为困难的，想当初，一个上海机器织布局，50万两股本，尚且筹备了十二年之久方才开车。如今，华盛集股85万两竟然如此迅速，其中纵官股甚多，也觉难以令人置信。因此，火灾损害程度并非如李鸿章说的那么严重是有道理的。

与此相关联的是关于盛宣怀的接办问题。杨通谊认为李鸿章命盛来接办是怀有个人目的的，笔者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盛宣怀是专门为李鸿章搜括私财的，而上海机器织布局三年功夫，营业兴盛，获利丰厚，使得李鸿章眼红起来，於是藉口火灾，就把杨藕芳赶下了台，由盛氏来接替了^③。结果盛氏接办后，不独无利，且历年亏折，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另行招商顶替时，竟亏银达16万多两^④。钱到哪里去了？可以肯定有相当部分流入了李、盛腰包，这可以从后来盛宣怀把该厂变为私产中窥见一斑。看来李鸿章是达到了目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火灾确实不那么严重。否则的话，李鸿章何以要命专为自己搜括私产的盛宣怀去接办这个几乎已成一片白地，损失惨重无利可图的烂摊子呢？盛氏又非善营工厂之人，1890年以前，他就曾主持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后来就被别人顶替了，可想在经营工业方面是一个无能之辈。李鸿章说该厂尽毁于火，很可能倒是

一种障眼法，以制造口实让盛宣怀接办，通过盛氏大捞一把，以便将该厂作为自己的私产一样摆弄。

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1893年间的经营活动对我国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是颇有影响的。一方面，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车生产标志着我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棉纺织工厂的诞生，它之创立开了我国近代资本主义棉纺织工业史的先河。另一方面，该局开车三年来营业兴盛，获利丰厚，直接刺激了当时的官僚、买办和商人投资兴办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特别是棉纺织企业的兴趣和热情，从而有利于近代民族工业和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发展。例如，杨氏下台后，心有不甘，便利用其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验，回家乡无锡在1897年创办了无锡地区第一家纱厂——业勤纱厂。可以这样说，上海机器织布局之所以能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与杨藕芳的活动分不开的。盛宣怀接办后改建成的华盛纺织总厂就根本不能与其相比了。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先后筹办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六七个人中，也惟有杨氏对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①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91页。

②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29页。

③杨通谊：《无锡杨氏与中国棉纺业的关系》载，《工商史料》2。

④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4页。

